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中国儒教史

ZHONGGUORUJIAOSHU

上卷

李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中国儒教史

ZHONGGUO RUXJINGSHI

上卷

李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儒教史:全3卷/李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9

(凤凰文库. 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7533-5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儒家—思想史 IV. ①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9759 号

书 名 中国儒教史(上中下卷)

著 者 李 申
责任编辑 戴宁宁 强 薇 尹子茜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40毫米 1/16
印 张 114.75 插页 12
字 数 1542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7533-5
定 价 298.00元(全三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主 编 赖永海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宁宁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儒教与儒教研究^①

(再版代序)

一、儒教简史

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并且这种演变和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自行的演变和发展。因而它的演变发展道路,可以作为宗教自行演变和发展的典型代表。

儒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有传说的历史时期,即尧舜甚至更早的黄帝和更前的伏羲氏时代。依据传说,在伏羲、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王者祭天的传统,因而具备了成为国家宗教的雏形,甚至已经由原始宗教演变为国家宗教。另一传说则认为,大约在黄帝的子孙颛顼氏时代,经过了一次重要的“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才逐渐摆脱了原始的宗教状态。此后的圣帝明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对这个宗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则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

^① 这是作者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2009年中国宗教问题蓝皮书》撰写的稿件,收入本书时做了修改。

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栖栖遑遑，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尊敬，他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因而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其中特别是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有）行为背后那无形可见（无）的东西，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

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暴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这样,儒教教义的演变也就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是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后一阶段是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以前的阶段称为“汉学”,而把宋代开始的儒学称为“宋学”。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在后人看来,他们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的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问题在于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天理开发出来,或者说,是把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显现出来。

“宋学”由于明朝的灭亡遭到了儒者们激烈的批评,认为是他们不重视实际治国本领的结果。清代儒者对于宋学多有批评,然而清代儒者已经不能提出新的主张,只能徘徊于汉学和宋学之间。

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儒教或许在长期徘徊以后会有新的建树。但是帝国主义出现了。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儒教及其载体清朝的国家政权,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面对着新的强敌,有的儒者主张应真正用儒经的教导来振兴国家和儒教;有的到过去不被重视的“子书”中寻找救国的答案。有的儒者则主张学习西方。首先是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接着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切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儒教国家宣布废除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取

士制度。这样，儒经就被搁置起来，儒教的理论层面被抛弃了。后来，辛亥革命暴发。新的共和国不祭天，也不祭孔，儒教的祭祀制度也被废弃了，而儒教的主体部分也就不存在了。

二、儒教的名称

孔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继承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不断创造和改进的事业。这个事业的目的，是使国家保持秩序，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幸福安康，因而儒教的基本主张，也被称为“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要保持秩序和稳定，用礼仪制度使人们养成安分守己的习惯，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也被称为“礼教”。人们在这样的秩序中，都有相应的地位；相应的地位都有相应的名称，比如君臣父子夫妇等。这相应的名称都有相应的要求。在实行礼仪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名称，对个人提出相应的、必须遵守的要求，因而又被称为“名教”。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但是以这几种最为普遍和流行，它们和儒教是同义语。

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

“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这或许仅仅是儒与教两个字偶然的连接。到了汉代末年，儒教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海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踰三千。”（《蔡中郎集》卷五《司空杨公碑》）^①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

^① 这条材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张践教授首先发现的。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是对于广大民众。这个教,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儒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甚至有意消灭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直到最近,还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迄今为止,至少是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一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中国历史上,最早自称宗教的是佛教,其次是儒教和道教。到了清代末年,儒者们已经把宗教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呼,来称呼所有的宗教了。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古代文献中,在和佛教、道教相提并论的文字中,都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一样性质的社会存在,区别仅仅在于为公为私,为国家还是为个人。在儒者们看来,儒教是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出以公心的宗教,而佛教、道教则是仅仅追求个人私利的宗教;或者认为儒教是禀承天意行事、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宗教;而佛教是仅仅诉

诸人的内心，教人不守秩序因而危害社会安定的宗教。而佛教、道教则认为自己是懂得人心的“内学”，而儒教不过是仅仅精通外在礼仪制度的学问。在通过神祇教育民众这一点上，则互相一致，而没有相互指责过。

与儒教同义的另一称号是“孔教”，孔教的字面意义是孔子之教。相当于把佛教称为“释教”，把基督教称为“耶教”，都是把该教中最重要的圣人作为教的代名词。意思是说，该教所遵循的，就是那位圣人的教导。

在中国古代，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教或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为国家宗教，其中包括由元代建立的政权，也把对天的祭祀作为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并以此为中心，按照儒教的要求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礼仪制度。

经过长期磨合，儒教、佛教和道教逐渐形成以儒教为核心和主导，佛、道二教为辅助，共同为当时的国家服务的局面，因而它们并称为“三教”。虽然伊斯兰教很早在中国就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群体，但仅仅是处于局部的宗教；基督教后来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直到清朝灭亡，儒教被弃，中国社会一直认为它是外来的宗教。所以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中国古代就只有三教并提。而把儒教和佛教、道教并称三教，也充分说明了儒教的宗教性质。

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中国古代儒佛道三教都认为自己是“圣教”。佛教、道教说自己是圣教，儒教则说自己是圣教。清朝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基督教的步步进逼，儒教仍然认为自己是圣教，而基督教等不是。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等等。起初是五部，后来发展到十三部，称“十三经”。现在一提到“圣经”，几乎人人都会认为指的是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是由于中国基督教徒这样地称呼他们所信仰的经典，而其他中国人则忘记了自

己历史的结果。至于与此相伴的“圣诞节”，在中国台湾称之为“耶诞节”，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圣人，是孔子。

三、儒教的信仰和祭祀制度(上)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指的是什么？也经过了一系列演变。

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由于甲骨文中有许多“帝”而没有天，有的学者就认为，商朝人的最高信仰是帝或上帝，而周代才信仰天，并且做出解释，说这是由于商朝是游牧民族而周人是农业民族的结果。然而《尚书》中商代和以前的文献，都明确地把天作为最高信仰。与《尚书》同等重要的《诗经》，其中周人的诗歌，也明确地歌唱着上帝。否认《尚书》中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根据的，《诗经》中有关上帝的诗歌，是不可忽略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周代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古人就把天或上帝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

上帝是什么？或者说，上帝是谁？这在基督教中，是被学者们称为“上帝观”的问题。基督教中有关上帝观的讨论，是该教神学最重要、也是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同样，在儒教中，对于什么是天或上帝的讨论，也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

依据现存的历史材料，特别是甲骨文中的记载，郭沫若等历史学家认为，商代的至上神是上帝，这个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先。而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汉之际，国家所祭祀的上帝有五位，他们分别是黄帝、炎帝；青帝太昊，也就是伏羲；白帝少昊和黑帝颛顼。而白帝之所以受到祭祀，乃是因为秦朝人认为，他们是白帝少昊的后代。

《史记》的本纪部分，把尧舜禹、夏商周的祖先，都追溯到黄帝，并且根据历史，认为只有上古帝王的子孙，才有可能成为天子。所以刘邦一个平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做了天子，这是使司马迁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史记》中的这种疑惑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只有上帝的子孙才可以作天子。而天子，起初也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称呼，即该人

是上帝的儿子。

天子必须是上帝之子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儒教的上帝观。汉代儒教，顽强地要为刘邦找一个上帝的血统，经过二百多年的寻找，到东汉，儒者贾逵从《左传》中找到一个叫刘累的，是一个夏代养龙的官。刘累是尧的后代，是刘邦的祖先。于是，刘邦就成了尧的后代，并且由尧可以上溯到黄帝，是黄帝的子孙。后来，王莽称帝，认为王氏是舜的后代；曹丕称帝，认为曹氏的祖先也是舜，并且都可以由舜上溯到黄帝。然而愈到后来，这样的努力就愈加困难，于是，儒者们用上了“感生帝”。

所谓“感生帝”，是汉代儒者们创造的概念。他们认为，天子的出生，一定是他们的母亲感受了天上某位上帝精气的结果，这个向天子母亲施加精气的上帝，就是该天子的感生帝。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不少政权就设立了感生帝祭祀，直到明代，感生帝祭祀才被取消。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不过今天的人们，包括许多历史学家，包括许多在儒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也都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个历史，在他们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常常说上帝是基督教的，而中国古代是不信仰上帝的。而由众多学者集体编写的权威性辞书《辞源》，收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词汇，甚至许多非常偏僻、少见的词汇，可见编写者的功力和修养。然而其中却漏收了一条，“昊天上帝”。这些数典忘祖的现象，都是由于忽略儒教是个宗教的结果。

古代的上帝，也称帝。帝加上“上”，起初未必是指天上的帝，更可能是指古代的帝。也就是说，上帝的“上”起初乃是一个时间概念，就像上古的上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后来，由于宗教观念的演变，帝被认为是到了天上，上帝才成为天上的帝。

由于上帝在天上，所以可以用天来代替上帝的称呼，就像《论语》中

孔子也用“泰山”指称泰山神一样。而到后来,用所谓“地望”代指其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习惯,比如“昌黎”指韩愈^①，“河东”指柳宗元。从上帝到天的这个过程,目前还仅仅是个推测,不过也是我们从历史材料中能够找到的迄今为止最合理的推测。

虽然根据历史文献,天和上帝甚至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是同义的概念。但在国家的制度中,秦汉之际祭祀的最高对象,仍然是上帝,并且有五位。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人建议说,天上还有个最高的神,叫太一,五帝不过是太一的辅佐。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最高神,于是,英明过人的汉武帝就接受了这个来历不明甚至经典上根本无所根据的上帝,把太一神作为国家祭祀的最高神。五帝的地位降低了。后来又有儒者造出了五帝的新名称。这新名称共有两套,其中一套被沿用下来,分别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炎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组。五帝新名字的出现,标志着由上古祖宗神演变成的上帝,将要退出作为儒教最高神的地位。

西汉末年,王莽、刘歆等儒者改革儒教的祭祀礼仪,依照儒经,把最高神称为“皇天上帝太一”。到东汉,仅仅称“皇天上帝”,而去掉了“太一”。

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儒经:“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从此以后,来历不明的太一神沉寂了,而儒教国家的最高神名称开始奠定在儒经的基础之上。

三国时代,儒教国家分裂。蜀国自认为继承的是汉朝正统,仍然祭祀皇天上帝;吴国称上帝为“皇皇后帝”,其根据在于《论语·尧曰篇》“敢诏告于皇皇后帝”。曹魏把自己的上帝称为“皇皇帝天”或“皇天之神”,不过是皇天上帝的变称,其根据,都在儒经。

其后的晋代和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更加严重。然而所有的政权在依据儒经确定至上神名称和按照儒教礼仪制度进行祭祀方面,则完全一致。

^① 韩愈祖籍实际在河南孟县,唐代称“河阳”,即黄河北岸的一片土地。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篇》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

上帝的名称，在明代中期，由嘉靖皇帝重新改称“皇天上帝”，被清代国家政权所接受。如今还存放在天坛公园内的上帝神主牌，写的就是皇天上帝。虽然如此，在国家的正式文书中，上帝的名称仍然常常被称为“昊天上帝”。而对上帝的简称，则依据儒经《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称为“皇上帝”。后来洪秀全建立“上帝教”，称他的上帝是“皇上帝”，其实是用了儒教的名称。洪秀全，从骨子里，仍然是个儒生。

隋唐时代，仍然保持着对五帝的祭祀，不过此时开始区分“五天帝”和“五人帝”。五天帝被认为是五行之精或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上帝，其中一位就是某朝天子的感生帝，可以作为上帝，陪同昊天上帝享受祭祀。而黄帝、炎帝等，则被认为只是“人帝”，即人间的帝王，而不是天帝，所以不能陪同昊天上帝享受国家的最高祭祀。儒教的上帝观完成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由于五天帝也称上帝，所以，唐代中期，在武则天主持下，儒者们确定，只有昊天上帝可以称天，而其他上帝不得称天。此时，天，才是儒教信仰的最高神，一般的上帝则不得与天并列。

四、儒教的信仰和祭祀制度(下)

儒教属于国家宗教，和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古罗马宗教、犹太教、印度教，还有日本的神道教，具有同样的特点。他们的神祇都是由以前的